

锻造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重要的武器”

——关于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思考

■周敬青

【核心观点】

-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既内含着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本根,又以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现实引领。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丰富实践,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形成的“催化剂”,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形成的“清醒剂”。
- ◆“五个抓好”具体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标定的“施工图”。要结合实际情况把“五个抓好”基本要求落实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事关党的组织建设方向性、原则性、战略性问题作出科学回答和时代表达,解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建设党的组织、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组织、怎样建设党的组织”等重大问题。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既体现了党一以贯之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又体现出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这一重大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百年来党的组织建设历史经验总结和客观规律把握而形成的真理性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指出了党的组织问题的重要性,把“组织”作为“最重要的武器”,强调“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路上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锻造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重要的武器”。

各要素的有机集成

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思想和科学内涵。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既内含着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本根,又以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现实引领。党的组织建设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才能确保方向不偏、立场不移、原则不失;只有全面贯彻这一科学理论,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具体任务、具体措施,结合新的实际推进改革创新,才能使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必须深刻领悟其科学内涵。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阐明了党的组织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问

题,把组织体系、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建设等关键内容都纳入其中,实现了组织建设各要素的有机集成,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六句话概括,既各自成篇,又融为一体,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相衔接,贯通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组织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建设,贯通认识论和方法论,应当联系起来理解、统筹起来把握,确保在贯彻实践中做到有力有效。

“催化剂”与“清醒剂”

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理论底蕴、历史积淀和实践向度。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底蕴、历史积淀和实践向度的内在统一。理论底蕴内含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思想的理论继承和发展,历史积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历史接续,实践向度昭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实践的逻辑延伸,实现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重视

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点。党的组织路线受政党性质制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决定党的组织路线的属性和特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建设思想。一部波澜壮阔的党的建设史也是党的组织路线孕育、形成、发展、创新的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探索了党的组织路线,提出了党的组织路线概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组织路线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丰富了党的组织路线的内涵,明确党的组织路线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党的组织路线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组织路线形成的“催化剂”,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烙印时代性、蕴涵科学性、建构系统性、持续继承性、发展原创性的源泉。党的建设也在与世界的空间维度中运行,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是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形成的“清醒剂”。

勇于直面现实问题

直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需要解决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实践的起点。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发展。如果只是学习停在文件上,开会挂在嘴巴上,研究止于理论上,那么,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就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新理念新思想,党的组织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紧密联系新形势新任务开展集中性教育;针对党员干部实际需求开展大学习大培训;坚持以上率下加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进一步明确各级党组织功能定位;分领域推进农村、社区、国企、机关、高校和各类学校、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创造出丰厚鲜活的实践经验。现实中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仍然面对一些挑战,影响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落实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如何解决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中的“拦路虎”“中梗阻”“断头路”问题?如何破解久治不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顽瘴痼疾?如何解决“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为官不为”“为官乱为”“官商逆淘汰”“老实人吃亏,投机取巧者得利”等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难题?如何铲除那些挑战民众和全党心理底线的“失职渎职”“贪腐恶霸”?在看到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必须保持政治清醒和战略定力,勇于直面在贯彻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制度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

把“五个抓好”落实到位

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有效路径。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战贫困、治污染、斗疫情、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根

本性变化,充分发挥了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一系列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措施路径已在党的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中生根发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以目标笃定方向,以目标鼓舞斗志,以目标引领作为,保持政治定力,持之以恒朝着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个既定根本目标奋力前行。“五个抓好”即“抓好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抓好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抓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具体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标定的“施工图”。要结合实际情况把“五个抓好”基本要求落实到位。要坚持理论和实践、上层和基层相统一。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不断推进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实践、理论、制度创新的新良性互动。根据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制度改革创新,用新的思路、举措、办法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研究”前期研究成果]

遵循城市发展规律 合理确定城市规模

■邓智团

城市规模决定着城市建设品质和城市运行效率,也影响着城镇化的空间布局 and 要素资源的配置。“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强调,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动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因此,合理确定城市规模成为当前完善城镇化战略、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

异。过去几十年里的表现是规模等级较高城市的规模增长较快,特别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城镇化贡献份额上升幅度最大。还需要注意的是,内部的人口流动仍造成区域间城市规模变化的差异巨大。如美国在二战后总人口增长超过2倍,但“铁锈地带”大多城市的规模并没有增长甚至出现收缩,如底特律,而“阳光地带”城市的规模则大多增幅巨大,如迈阿密甚至扩大超10倍。此外,对个体城市而言,城市规模还取决于自身承载能力和发展机遇变化。自然区位相对稳定,有较好自然区位的城市通常更早获得比较优势,如同等开放条件下的沿海、沿江城市通常会率先发展。而经济区位则动态变化可能性较大,如交通区位、与超级城市的空间距离、开放环境等的改善均相对容易,甚至成为推动一些城市超常规发展的力量。

式确立。合理确定城市规模还要积极把握我国城市在市籍空间、户籍制度和用地管理的个体条件。就市籍空间而言,欧美国家城市基本上是完全城镇化区域,市域外则是郊区,郊区之外则是农村。我国城市则有所不同,包含一个欧美国家意义上城镇化区域的“城市”,即中心城区,还有中心城区外由若干中小城镇和农村组成的郊区。而中心城区之外的空间,正是我国城市相比欧美城市可承载更多发展要素的原因所在。户籍制度是我国城市必须考虑的另一重要因素,城市常住人口中有大量稳定性不足、流动性很高的非户籍人口,很容易造成城市间公共资源重复配置,间接增加全国城镇化的整体成本。当户籍制度与城镇等级挂钩,较高的落户门槛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城镇化预期,对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变化都产生直接影响。此外,用地管理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的规模变化。国土空间规划通常会框定一个较长时期(10—20年)城市建设用地总量,而城市发展是迅速变化且有区域差异的,很容易导致城市用地供给与发展需求间的不匹配,如东部城市用地增长大多高于人口增长,造成用地相对紧缺,城市规模增长必然受限。

因势因地制宜确定城市规模

当前中心城区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我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东中西和南北区域差异并存,不同区域城市面临的宏观环境以及自身条件差异明显,要因势利导顺应城市规模变化的客观规律,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一是要弱化城市规模的超常规增长预期。虽然城市规模可以随着技术进步、交通设施改进、污染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曾经由西向东大规模省际以及城乡人口迁移已急速减少,区域分化在向区域均衡转变,而新发展理念让人口、土地、生态、城市安全等底线约束不断升级,外延式城市发展根本难以以为继,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得到正

理性认识城市规模变化的客观规律

实现科学合理确定城市规模,需要我们理性认识城市规模变化的客观规律,科学把握我国城市规模变化的客观条件。城市规模变化存在客观规律,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发展环境,也取决于单个城市自身条件。城市规模变化在时间上存在阶段性,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阶段变化。社会经济大多会经历发展水平从低到高以及发展速度从慢到快到慢的阶段过程,城镇化也对应地形成三个阶段:速度不高、城镇化率低于25%的初级阶段;速度加快、城镇化率提升到60%—70%的加速阶段;速度趋缓、个体城市与国家总人口的规模变化几乎一致的城镇化成熟阶段。这在城市规模变化上也直接体现出来,有一个从慢到快到再到慢的明显阶段性。如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发展时期,城镇化率迅速上升,个体城市规模增长也十分迅速,在二战后进入到城镇化成熟阶段后,个体城市规模变化基本上与国家总人口规模变化总体相近。

准确把握城市规模变化的客观条件

当前我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城镇化水平也超过60%,逐步进入城镇化成熟阶段。城市进入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的新型城市建设新阶段,加之我国城市自身特色明显,合理确定城市规模需要准确把握决定我国城市规模变化的客观条件。合理确定城市规模首先要准确把握我国城市的宏观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超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巨量成本极低的劳动力,城市的数量与规模都得以迅速增长。随着我国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人口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大规模、低成本人口转移逐步转变为小规模、高质量、高成本的人口流动,城市数量与规模扩张的外部驱动力弱化。近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曾经由西向东大规模省际以及城乡人口迁移已急速减少,区域分化在向区域均衡转变,而新发展理念让人口、土地、生态、城市安全等底线约束不断升级,外延式城市发展根本难以以为继,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得到正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讲话中两次讲到作为实业报国的典范和近代城市建设的先驱——张謇。张謇既是现代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实业家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和治理最伟大的先行者。在深入研究和总结张謇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方面的历史经验,构建和阐释张謇人文城市理论,对于进一步传承弘扬作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的张謇精神,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高水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謇很好处理了“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为,以工商富民与产业立城为根基,但最终把城市建设治理落实在文化和教育上,并在后者和前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共生共荣的良性关系。正如张謇说“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这是张謇和近代南通留给当今人文城市建设的一笔珍贵精神遗产。吴良镛认为:“张謇修马路、建博物馆、建五山公园,不遗余力地开展城市建设,并以一种诗人的情怀经营城市,努力使人民有安居乐业之所”。以新型教育为例,从1902年捐资创建通州公立师范学校开始,张謇陆续创办了女子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同时还开设法政讲习所、地方自治研究所、巡警学校、监狱学传习所、女工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农工学社等实业教育。张謇还大力从事福利社会体系和新型慈善事业的建设,创办有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厂、济良所、残废院、恤孤所等,使当时的南通成为一个幼有所教、老有所养、贫有所抚、病有所医的“模范城市”。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张謇的城市建设还包括了新闻出版、博物馆、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公园、新式剧场等近代城市公共文化方面,这就远远超越了城市的经济、军事、商贸等传统功能,而是在很大意义上切近了“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城市最高本质。因此,鲁迅先生的朋友内山完造把南通誉为“中国的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可以说,张謇不仅在空间和功能上规划了“中国近代第一城”,在城市发展形态上也创立了“中国近代人文城市的杰出典范”。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人文城市”建设。在理论上讲,人文城市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城市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这是一个新的城市发展观,揭示出理想城市不只是人口增加,也不只是经济增长与财富聚集,而在于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由此可知,人文城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真正的理论代表。

张謇与『中国近代第一城』

■刘士林

自“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人文城市规划建设,初步形成了五个层级的框架体系:一是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代表的文化带;二是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首次提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为代表的文化中心城市;三是以《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为代表的新型人文城市;四是以2017年文化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及特色小镇建设》课题研究成果为标志的特色文化小镇;五是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传统村落”评选为标志的传统村落。

章开沅在《张謇传》一书中指出:“他从来不是想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想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以“建设一流新世界雏形”为理想,张謇的南通城市建设体现了近代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社会管理治理、城市文化建设的最高水准,并在很多领域走出了和西方近代城市化不同的道路,成为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最早的先行者和杰出样本。(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学院院长、南通大学张謇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